

直布罗陀与现代国家的相对性

何塞·韦加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博士生及FPU研究员

关于国家本质的讨论一直是现代历史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之一。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统治者的合法性基于上帝的意志、经济和军事实力，或属于某一阶层或家族。在某些地方，情况仍然如此。然而，自18世纪以来，现代自由政体在欧洲和世界的传播改变了大多数国家的这一范式：如今，是民族，“我们人民”，支撑着政府的行为并赋予其合法性。

但国家到底是什么？国家是拥有固有、明确且永恒特征的存在，还是仅仅是依赖于特定背景的政治项目或想象的构想？在学术界，这场辩论中存在两种基本立场（史密斯，2013）：一种是建构主义的，根植于法国和英美启蒙思想；另一种是本质主义的，更多发展于德国唯心主义。让-雅克·卢梭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强调人民联合组成国家的意愿，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则提出了每个民族所特有的“特殊法则”或独特“精神”。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影响甚至指导着政治行动。如果国家拥有本质上属于自己的精神、语言和土地，那么它们总是有理由宣称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巴勒斯坦的土地将永远属于犹太民族，即使已经过去了数千年；前俄罗斯帝国及后来的苏联人民必须永远忠于莫斯科；奥地利人和一些瑞士人无论是否愿意，都永远是德国人。然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相反的证据，显然国家可以扩张或缩减。今日加里宁格勒的前柯尼斯堡还剩下什么？爱奥尼亚和士麦那的希腊人怎么样了？巴西还是葡萄牙的吗？比利时的瓦隆区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伊斯特拉应该归还给意大利吗？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吗？

本质主义的国家观因过去和现在引发的众多冲突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前提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仅仅解释为欧洲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整个扩张计划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气息（格里芬，2018）：无论是将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民团结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还是为国家赋予更大的领土以发展。

民族主义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并转向更符合自由与民主标准的形式。当前，知识分子和大部分自由政治派将国家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例如，安德森，1983；霍布斯鲍姆，1992；努涅斯-塞克萨斯，2018；卡吉亚奥·孔德，2022），即使它通常拥有文化特征和参考领土，但其存在主要依赖于组成它的个人的意愿。然而，本质主义民族主义的痕迹至今仍然存在，维持着过去的冲突或预示着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如果我们关注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可以观察到俄乌冲突（至少关于克里米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一些人简称为台湾）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长期争端、中东地区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以及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紧张局势，或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始终动荡不安的局势。

一个不太为人所知但能够说明这些问题即使在老欧洲也依然存在的冲突是西班牙和英国之间持续了300年的争端，这一争端不时地重新浮出水面，成为欧洲大陆和岛屿国家媒体报道的焦点。这可以作为本主题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直布罗陀是一块不到7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南端。阿拉伯人称之为“塔里格岩”，这块岩石在15世纪被卡斯蒂利亚人从格拉纳达酋长手中夺得，此后一直是王室船只的避难所、控制大陆与马格里布之间海峡航行的要点，以及与所谓的穆斯林“野蛮王国”战争中的军事要塞。根据编年史家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德·阿亚拉（2007 [1782]）的记载，到17世纪末，该城已有约6500名居民，拥有以葡萄酒和鱼类为基础的有趣经济，这些产品出口到一些国内和国外市场，并且严重依赖于附近的阿尔赫西拉斯湾地区。

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间，一支由英国、荷兰和加泰罗尼亚军队组成的联军，在赫塞-达姆斯塔特王子乔治的指挥下，以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大公（西班牙王位觊觎者）的名义攻占了这座要塞。随后，在1713年，随着安茹的菲利普（后被称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一方的胜利，一系列条约在荷兰城市乌得勒支签署，以结束战争。其中，西班牙和英国王室之间的和平条约规定，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但附带一系列条件：不允许穆斯林或犹太人定居，不得停泊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战舰，不得在未首先给予西班牙赎回机会的情况下转让这些财产，并允许天主教宗教自由行使。

直布罗陀的割让因条约措辞的模糊性而最具争议（德尔瓦列·加尔韦斯，2013；贝尔杜·巴埃萨，2015）。所使用的公式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割让了什么以及如何割让，而且看起来西班牙人只是将城堡围墙内的部分交给了英国人。然而，英国人控制了整个岩石并对其进行了治理。征服后，大多数原住民被驱逐，直布罗陀成为了一个军事要塞、船只停靠点和18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贸易中转站。

《乌得勒支条约》的几乎所有条款都以某种方式遭到了违反，最终这块领土的新主人甚至进一步扩张了他们的统治范围。尽管西班牙王室在多次场合（1726-1729年的英西战争期间以及1779-1783年西班牙参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试图武力收复直布罗陀，但不得不在新签署的条约中一再接受割让的维持和协议的有效性。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直布罗陀在政治和经济变革中蓬勃发展。工业革命和海峡航运的增加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据点。它发展出自己的中产阶级，这一阶层逐渐学会了捍卫自身利益并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到1801年，当地报纸如《直布罗陀纪事报》已经开始发行，1830年，直布罗陀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哨所转变为“王室殖民地”。它的进步促成了各种机构的建立，如商会、卫生委员会、交易委员会和直布罗陀雇主联合会，这些机构证明了20世纪末该地区已经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的活力。

与西班牙领土的联系并没有消失。据估计，到本世纪末，每天约有10,000至12,000名西班牙人越境到该市工作。直布罗陀湾对直布罗陀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当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试图限制贸易并更严格地打击走私时，西班牙小镇拉利内亚德拉孔塞普西翁的人口从63,000人减少到35,000人（参见Grocott & Stockey, 2012）。我们知道，边境两侧的婚姻并不罕见，双方都享有一些节庆活动，如皇家卡尔佩狩猎活动，而且当地当局不止一次地互相致以祝贺和礼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发展出了一种英语和西班牙语混合的当地方言——拉尼托语。

然而，这种在地方层面上的良好共存和共生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得到体现。西班牙政府和大部分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国家耻辱，是国家历史弱点的象征，需要尽快得到纠正（Sepúlveda Muñoz, 1996）。随着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独裁统治的到来，这种情绪更加凸显，他从1936年至1975年通过政变和内战统治西班牙。在这四十年里，他的政权多次试图将直布罗陀并入西班牙。

然而，这并未能如愿。1967年，作为联合国授权的非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直布罗陀人投票选择是希望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获得自己的宪法和广泛的自治地位，还是与西班牙合并。在公民投票中，

选择继续留在英国治下的票数超过了99%。西班牙方面的反应迅速：关闭了边境，实施了1969年的“铁门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独裁者去世后的七年，即1982年。这一政策带来的唯一结果是增加了苦难、家庭分离和许多曾将直布罗陀与西班牙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断裂。

民主西班牙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促成了2002年的一次新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共同主权的问题，结果“反对”票再次以压倒性多数获胜。这并不妨碍如今大多数倾向于西班牙民族主义的政党继续要求就直布罗陀问题达成新协议，而且这一冲突经常出现在新闻中。从西班牙政客游过海峡在直布罗陀岛上展开西班牙国旗（GBC News, 2016），到欧洲足球锦标赛冠军在狂欢的人群前高呼“直布罗陀属于西班牙”（Greenall, 2024），无不体现了这一点。沟通问题继续引发问题，包括缺乏打击走私的承诺（Agencia Tributaria, 2023）和关于直布罗陀领海的冲突（Pérez Sierra, 2022）。

这段漫长冲突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现象的复杂性，以及曾经属于一个国家的领土如何可能不再如此。民族主义，这一并非必然负面且是我们政治系统和身份认同重要组成部分的事物，如何被用来基于本质主义和非务实的论点推翻其他民族的意愿。直布罗陀几个世纪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当其人口已不再相同，并且明确表达了不愿成为该国一部分的意愿时，18世纪签署的条约就失去了其论证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管理国际和身份冲突中最常见的错误：缺乏对民众的关心、缺乏务实精神、双方缺乏对话与合作，以及关系和中断沟通。由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所驱动的社会运动和政府导致了国际冲突的持续，而这些冲突对任何涉事方都没有好处。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悖论，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冲突。

参考文献

AGENCIA TRIBUTARIA, "The Tax Agency seizes 24,000 packets of contraband tobacco in Campo de Gibraltar", 19/12/2023. Available in < https://sede.agenciatributaria.gob.es/Sede/en_gb/informacion-institucional/sobre-agencia-tributaria/La_Agencia_Tributaria_incauta_24_000_cajetillas_de_tabaco_de_contrabando_en_el_Campo_de_Gibraltar.html > [august 2024]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2016.

BURKE, Stacie & Sawchuk, Larry, "Alien encounters: the jus soli and reproductive politics in the 19th-century fortress and colony of Gibraltar",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6, 2001, pp 531-561.

CAGIAO Y CONDE, Jorge, *Democracia y nación. España en el laberinto plurinacional*, Catarata, 2022.

DEL VALLE GÁLVEZ, Alejandro, "¿De verdad cedimos el peñón? Opciones estratégicas de España sobre Gibraltar a los 300 años del Tratado de Utrecht",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LXV, n. 2, 2013, pp. 117-156.

GBC News, "Spanish Flag Incident; Vox President pleads guilty", GBC News, 22/06/2016. Available in < <https://www.gbc.gi/news/spanish-flag-incident-vox-president-pleads-guilty-32480> > [august 2024]

GREENALL, Robert, "Euro winners chant 'Gibraltar is Spanish' at parade", BBC News, 16/07/2024. Available in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k3zlpd5l4o>> [August 2024]

GRIFFIN, Roger, *Fascismo*, Alianza Editorial, 2019.

GROCOTT, Chris & STOCKEY, Gareth, *Gibraltar. A Modern History*,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2.

HOBBSBAWM, E.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LÓPEZ DE AYALA, Ignacio, *Historia de Gibraltar*, Oxford University, 2007 [1782].

NÚÑEZ SEIXAS, Xosé Manoel, *Suspiros de España. El nacionalismo español, 1808-2018*, Crítica, 2018.

PÉREZ SIERRA, "Gibraltar: el problema de las aguas y la cuestión territorial", *Anales de Derecho*, n. 39, 2022, pp. 1-19.

SEPÚLVEDA MUÑOZ, Isidro, "Instrumentalización nacionalista del irredentismo: Gibraltar y el nacionalismo español", *Spagna Contemporanea*, n. 9, 1996.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Polity*, 2013.

VERDÚ BAEZA, Jesús, "Las aguas de Gibraltar. El tratado de Utrecht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Mar", *Cuadernos de Gibraltar / Gibraltar Reports*, January – December 2015, pp. 97-132.